

目 录

黎段矛盾与府院冲突·····	曾毓雋(1)
西原借款·····	周叔廉(7)
曹錕賄选总统始末 ·····	王 坦遺稿(21)
江浙战争的前因后果·····	邓汉祥(34)
齐卢之战紀略·····	馬葆珩(41)
臧致平、楊化昭自閩突圍入浙記·····	张义純(56)
馮玉祥督豫前后·····	刘 驥 邓哲熙(67)
曹錕和王承斌的关系点滴見聞·····	潘承祿(72)
鸡公山會議的前因后果·····	馬彥耕(76)
国民二軍与鎮嵩軍之战·····	张 鈞(83)
直系軍閥大联合的酝酿和失敗經過·····	孟星魁(98)
孙传芳反奉联奉始末 ·····	楊文愷(103)
楊宇霆督苏被逐記·····	刘翼飞(113)
郭松齡反奉亲历記·····	魏益三(119)
張作霖击败郭松齡的經過·····	王之佑(129)
附赵毅关于本文的补充和訂正	
郭松齡反奉期間張作霖与日本的勾結·····	阮振鐸(159)
馮玉祥、郭松齡联合反对張作霖的經過·····	吳錫祺(168)
东北边业銀行始末記 ·····	韦錫九(177)

张作霖二三事·····	栾贵田(196)
吴佩孚过甘见闻(五篇)·····	韩定山等(199)
吴佩孚与日伪的勾结·····	陶 菁(215)
我所知道的靳云鹏和靳云鹗·····	谭志清(226)
1924年溥仪出宫前后琐记·····	溥 佳(246)

附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征集辛亥革命史料工作总结····· (27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北洋政府时期史料征集工作的意见···(285)

附注

对《曹錕贿选总统始末》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四十八辑二五二页。

对《江浙战争的前因后果》一文的订正见《选辑》第五十一辑二七三页。

对《齐卢之战纪略》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四十三辑二八一页、第五十一辑二七一、二七三页。

对《杨宇霆督苏被逐记》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四十三辑二六八页。

对《张作霖击败郭松龄的经过》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四十三辑二六八页。

黎段矛盾与府院冲突

曾 毓 雋

袁死黎继之经过

1916年5月袁世凱病篤，知帝制不可为，有悔意。先由袁之千夫人以电话告段祺瑞之張夫人，謂元首抱病，急于一晤芝泉，汝先疏通，即有后命。盖張夫人系千夫人之义女也。張夫人为前江西巡撫張芾之姪孙女，父名瀛，字步洲，在山东与袁交好，步洲早逝，母陈氏不两年亦去世。千夫人撫养張女如己出，段元配吳夫人逝世，即由袁夫妇主婚，以張女归段为继室，往来甚密。段在1915年5月31日，因反对袁之帝制，在陆军总长任内引病开缺，給假两月，并頒入葠四两，医药費五千元，以資摄卫。段乃在家閉門謝客。得千夫人电话之次日，政事堂果傳話邀段。段到，徐世昌已先在座，我亦随段同往。因段謂我知医，在旁察言觀色，便知病之輕重。袁住在中南海万字廊后一大院落中。袁在病榻上接見，面色紅赤，說話气力尚照常，案上所列皆中医脉案与药方。袁对段云：我老且病，悔不听汝言，故有今日，取銷帝制汝可相助为理乎？段云：当竭力相助，容与东海熟計之。稍坐即离去。

1916年5月8日，改政事堂为国务院，仍照民国元年官制組織政府，任命段祺瑞为参謀总长。不久因徐世昌辞国务卿职，以段继之，即电南京馮國璋商挽大局，于是有南京會議之召集。不料南方

进一步促袁下野，馮段正在疏通：而北洋系督軍亦漸不听话，四川陈宦、湖南湯薌銘等，先后通电反对帝制。外交陆征祥、财政孙宝琦，相继辞职。袁病势愈殆，旱医亦告束手。

段派我赴南京以详情及大局形势面陈馮国璋，并商以袁死以黎继之事。当日安徽督軍倪嗣冲亦在南京，对我质問云：“汝在幕后帮助段合肥反对帝制。”我答云：“我乃閹民无常职之人，又非袁党，有何能力反对帝制。至于段之反对，乃段个人見解問題，我不能左右之。至于今日我奉命来此，因袁病重，命在旦夕，商量继任人选問題。今日不是反对帝制。”倪始无言。馮国璋等亦认为黎本为副总统，順理成章，非他莫属，乃复电贊成。6月6日袁逝而黎继。

黎段矛盾与府院之爭

黎就职后，意图恢复国会。黎以約法中大总统权限太小，欲乘机扩张。段则以国会重开，諸多掣肘，意在迁延，可得一时之便利。此乃黎段意見分歧之开端。后南方各省一律主張恢复約法与国会，而海軍李鼎新竟有独立宣言，要求恢复国会。段迫于当时形势，亦无可奈何。1916年6月29日，黎令召集国会速定宪法，并召开选举副总统大会。馮国璋当选，議宪开始，气象一新。但有部分国民党議員，欲結黎傾段。此次組閣本属混合制，国民党閣員及議員居多，故多数拥黎，而黎頓覺局面迥非昔比。双方左右媒孽乘机挑撥，府院之間冲突愈形尖銳。孙洪伊以閣員身份，日在总统府指揮一切，徐樹錚心尤不平。适中国銀行为兌現，借到美金五百万元，言明按九一交款，未与銀行团商量。此事本系閣議秘密通过，亦为黎所贊成，而孙洪伊将此消息漏泄之。报纸竟将原条文宣布，五国銀行团来函抗議。市面先时中国銀行票价，仅四五折左右，若能保守秘

密，則借款到手，暗中逐漸收回中票，則此項借款可于中票收回后，尚可留为整理善后之用。但孙洪伊泄之，引起外交抗議，风声所播，市面中国銀行票价陡漲至八折以上，故又費尽力量，中行始克兌現。徐樹錚又搜得情报，謂孙洪伊之为此，因其个人先以賤价收买中票，故利于未兌現前中票先漲价，借获厚利，損公利己。故段认为此人不能共事，去孙之意甚决。而徐樹錚与孙洪伊，因此事在閣議时互相冲突。府中則每以无关系之用印小事多方指摘，以致狂躁之徐樹錚难于相容，府院之間成見日深。黎素不滿徐樹錚之跋扈，亦欲去徐。乃由許世英主張，作孙徐两罢之議。于是孙洪伊免去內务总长之职；徐樹錚免去国务院秘书长之职，以張国淦继之。因張国淦系湖北人，利用其調停府院之間关系，以为从此可苟安矣。

不意一波初平，一波又起，徐樹錚与許世英本无怨无德，此次徐之下台，发动在黎，徐迁怒及許。因許世英画蛇添足，于事后以一函致段，函中謂徐樹錚學識精力尽有过人之处，但彼既弃文学武，宜就其所长，加以驅策，政治非其所长，不如任以武职；且彼門戶之見稍深，与段兼容并包之旨亦不相合，武职尽多要津，若能用其所长，則所以保全樹錚，亦即可以保全总理，云云。在許以为詞甚婉轉，在段視此函为平常，并未秘藏。不料此函又为徐樹錚所見，大中其忌，謀以报复。

适交通部与各路局局长以運輸快車有租車之議，租約五年，每車每日以三元計租，照市价約值一千八九百元。按三元計租，則車商不到两年本息即可相抵，所余三年多，租价皆属盈余。且洋商攬售運輸車者甚多，亦可分期还款。租車之議弊端太大，而彼輩犹以每日三元为未足。商人系金蔭淦、鮑星槎新立公司，递呈到部。乃次长王黻樵将原呈內三字改为四字，且眉批云：“部章各局互

相調用，車輛系每日每輛作價四元。此件退回。”金鮑兩人本系黑窟生意，即以此件示各洋商，蓋表示其門路甚寬，以便向各洋商賒賬也。不料各洋商將其原件用照相機拍照，留存此照片。如何又落于徐樹錚之手，則不可知。

先是四五個月以前，許世英忽向段前請派我為京漢局局長。因當是時我正在國務院任秘書，我表示不願就，與許同在段前交涉。許謂：“屈汝為局長，為我作耳目也。”段遂勸我暫就，為許幫忙。至租車之議垂成，王家儉、姜可欽、盛文頤三局長，以合同見示，且約聯名。我立時却之，且告以租價驚人，須知車非路軌何能運輸，一切費用在內，故每日定為四元；且各局互調，報銷歸部無分彼此。商人只有一車，何能引此例為比較。外議沸騰，囑其謹慎行事。我即夕以此事始末告之于段，段謂許雋人何言。我答尚未往見。段曰速去速去。我到許宅，謂許已四處尋我。因彼已得王家儉報告，我推却簽此合同。于是許垂詢及對此事意見。我乃以此事決不可辦之理由告之，且告以禍在目前。我聞徐樹錚已將王黻煒通同舞弊之確據，日內必定在檢察廳起訴，并告其金、鮑等人新組織之公司，虛有其表，彼原系德商買辦，大戰後失業，故冒險作此勾當。許謂此等內容我均不知，即夕派參事雷中夏、路政司司長曾鯉化查辦。雷秘告王黻煒，即夕潛逃。次長既逃，遂將王家儉、姜可欽、盛文頤等正副局長送法庭辦理，許一面對黎、段自請處分，求去。經黎、段挽留，此事始告終了。徐樹錚去職之後，在府院之間，尚引起此一段風波也。

黎段失和主要原因

黎就職後，以黎段素日交情，又兼以此次擁戴繼任大總統，宜可訴合無間。蓋黎人居東門外胡同榮祿旧邸，系洪宪之賜第，黎以武

义亲王之身份入居，与領銜劝进等等行动，当时非不可加以挑剔。而段为顾全大局，在所不計，故就职之初，意見甚融。后以黎之左右，如金永炎、哈汉章、黎澍、丁佛言等，所謂四大金剛是也，从中挑撥作梗；徐树錚任国务院秘书长，不但不从中拉攏，常以小事屡次与府員冲突。

对德宣战为黎段失和主要原因。盖段祺瑞虽早岁留学德国，却无盲目崇拜之意；另一方面得梁启超文字上、口头上之力不少，因梁曾有文字条陈說明外交关系与德国当时形势，故段主張对德宣战最力。經两院开会通过对德断絕邦交，国务院即組織国际政务評議會。除总理与外交总长为正副会长外，并函聘王士珍、陆征祥、熊希齡、梁启超、孙宝琦、汪精卫、汪大燮、張国淦等为評議員。关于处理德侨与对协約国应提条件、招募华工、供給物資、改正关税、巴黎經濟同盟以及将来在議和大会上应提出各項問題，均在討論之列。继而德国公使辛慈出境，我国駐德公使顏惠庆回国，收回德国租界及津浦北段租权，停付德国賠款，处理德侨德商等，次第施行。突接荷兰公使照会，以絕交与宣战不同，不能适用待遇敌人条例，又称已受德国委托代管在华利益。事勢因此緊張，不免棘手。而协約国劝誘参战者紛至沓来，且美国、日本此时已先后加入战团。段以德国虽强，寡不敌众，料其必敗；且日本既已加入，我若不参加，日本对于山东青島势必染指掠夺；又以我国駐外各使，电告协約国对条約修改、緩付賠款等均允許商办；而荷兰交涉又如此緊張，促使段对德宣战主張，更为坚决。若黎元洪在袁世凱帝制时代之态度，在段以为极易就范。不意黎性闇弱，惑于丁佛言等中立之說；且认为断交已属好大喜功之举，参战則更为危險。适此时国民党議員又得其党内指示，极欲借端倒段，盖欲先倒段再議外交，簡而言之，即

不欲段在外交政策上成功，提高其威望也。尤可憾者，黎阁弱无能，为其左右所利用，另一方面黎又以议员为后盾。而在段以为对德断交时，通过甚容易，对议员疏通亦未周密布置。当黎氏不得已以参战案交议会时，人杂言庞，议员对参战案相持不决时，段方在议院中，此时适有不达事理之傅良佐未得段氏同意，纠合公民团扰乱议院。虽经段召兵警将公民团解散，而多数议员借为口实，实行散伙，致开会皆不足法定人数，作为对参战案之消极抵制。

徐树铮事事占先，独于对德宣战抱消极态度。因徐素日崇拜德国，谓民族优秀，科学进步，无战败之理，屡次上书段祺瑞主张不可参战，应守中立。有一次徐树铮为参战事，又上书段氏，段当面将上书弃之于地。以后又发现徐树铮暗中与安徽督军倪嗣冲、湖北督军王占元示意，嘱其电请中央维持中立。及段电召各省督军来京议政，各督军皆拥护宣战政策。据倪、王并称：前此有电请维持中立者，系徐树铮示意，今日来京方知参战之必要。徐树铮遇事与总统为难，独于参战与黎看法相同。于时各督军曾邀两院议员在外交大楼当面疏通参战事，并面陈黎总统。黎认为此事应由议会主持，非督军所应于干涉。而议员则仍保持消极态度，尚以法定人数不足作借口，故无法开会。各督军以一电攻击宪法之歧误，相率从容出都。段在平时一怒便拂袖而去，此次为力争参战，偏倔强不退。黎乃毅然将段免职，以伍廷芳署总理。各省始则通电指责副署违法，继则通电独立。当此是非纠纷之际，徐州又召开督军团会议，复辟之谣已炽。黎不但不闻不问，反明令张勋随带八千兵入卫，复辟之机伏矣。

本文的更正：第4页例1行至第5页第2行“盖黎入居东厂胡同……在所不计，”删去。

西原借款

周 叔 廉

西原借款一名詞，人多知之，但是知道它的內容及詳細情況的可能并不多。《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登載叶恭綽寫的《西原借款內幕》一稿，似乎还不够詳細，其借款數目亦小有出入。至于說當時段政府對日借款總數共達五萬萬元的數目是不確的，實際並沒有這樣多。我對這個借款稍為知道一點，特為詳細介紹一番。但是，閱年較多，可能有記憶錯誤的地方，希望知道的人加以指正。

属于西原借款範圍內的各項借款及其條件

（一）交通銀行第一次借款日金五百萬元。

1917年1月20日由交通銀行總理曹汝霖、協理任鳳苞與日本興業銀行、台灣銀行、朝鮮銀行（以下簡稱三銀行）代表日本興業銀行理事二宮基成簽訂。期限三年，實足交款，年息七厘半。担保：隴海鐵路債券、中國政府國庫券及中國政府欠交通銀行債權証書三項共7,725,687.68元。

（二）交通銀行第二次借款日金二千萬元。

1917年9月28日由交通銀行總理曹汝霖、協理任鳳苞與三銀行代表日本興業銀行理事志立鉄次郎、台灣銀行理事山成乔六簽訂。期限三年，實足交款，利息年息七厘半。担保：中國政府國庫債

券二千五百万元。

(三)有线电报借款日金二千万元。

1918年4月30日由交通总长曹汝霖与中华汇业银行总理陆宗輿签订。期限五年，实足交款，利息年息八厘。担保：中国全国有线电报之一切财产及其收入。

(四)吉会铁路垫款日金一千万元。

1918年6月18日由交通总长曹汝霖与日本三银行代表日本兴业银行代理总裁真川孝彦签订。期限：吉会铁路正式借款成立尽先偿还，实足交款，年息七厘半。担保：以国库券按贴现方式办理。

(五)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日金三千万元。

1918年8月2日由农商总长田文烈、财政总长曹汝霖与中华汇业银行总理陆宗輿、专务理事柿内常次郎签订。期限十年，实足交款，年息七厘半。担保：吉黑两省之金矿及国有森林以及上两项所生属于政府之收入。

(六)满蒙四铁路^①借款日金二千万元。

1918年9月28日由驻日公使章宗祥与三银行代表兴业银行副总裁小野英二郎签订。期限：于满蒙四铁路正式借款合同成立后募得基金优先偿还。实足交款，年息八厘。担保：以中国政府国库券按贴现方式办理。

(七)高(密)徐(州)、济(南)顺(德)铁路借款日金二千万元。

1918年9月28日由驻日公使章宗祥与三银行代表兴业银行副总裁小野英二郎签订。期限：于两铁路正式借款合同成立后募得基金优先偿还。实足交款，年息八厘。担保：以中国政府国库券按贴现

① 四铁路：1.热河至洮南；2.洮南至长春；3.吉林至开原；4.自热洮路之一点达于海港。

方式办理。

(八)参战借款日金二千万元。

1918年9月28日由駐日公使章宗祥与三銀行代表朝鮮銀行總裁美濃部俊吉簽訂。期限一年，实足交款，年息七厘加貼現用費一厘。担保：以中国政府国庫券按貼現方式办理，到期后以同一条件換发新券抵換。另有換文指定以将来整理新稅之收入作为偿还財源。此借款指定交付于直接主管国防軍隊机关所屬之經理主任。

以上八項借款总計日金一亿四千五百万元。

日本对西原借款的政治背景

日本大隈內閣以强硬手段对华提出二十一条交涉，遭到中國人民一致的激烈反对，因此极为日本元老派和其他持重穩健人士所不滿，就以对华外交办理不善的原因而下台。继任內閣首相为寺內正毅，是元老山县有朋的嫡系人物；外务大臣为本野一郎，大藏大臣为胜田主計。他們鉴于前內閣之失敗，为謀改变其政治面貌和政策路綫起見，挂出“中日亲善”的牌子作为对华外交方針，以期改善中国人民对日之情感，緩和欧美各国之空气，乃以大量借款貸与中国，条件并不苛求，以示“亲善”之誠意，而扫除原来之誤解。此为日本西原借款政治背景的第一个原因。

北京的北洋軍閥政府自从袁世凱死亡以后，恢复旧約法，黎元洪继任总統，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实行責任內閣制，政治大权掌握在段的手中。段祺瑞是北洋軍閥派的一个实力首脑人物，为人十分剛愎，对黎的总統不能尊重而合作，致釀成府院斗争，張勳因之乘机而有复辟之役。討平复辟之后，馮国璋继任总統，段复任总理。日本的寺內內閣看中了段祺瑞这个人，认为一定可以继袁世凱之后掌

握中国的政权。但是，看到段的武力财力两项都还不够，乃专心一意援助段氏，扶植其实力帮助他成功，好为将来挟持侵略的工具。这是寺内的政策，是十分坚定的。他对于中国其他的军阀如馮国璋、曹錕等人，从来也没有加以顾盼和周旋，真可以算得非常彻底而毫不摇动。此时西南各省已经是形同割据各自独立。日本乃充分给段以财政上的援助，帮他建立参战军队（欧战结束后改为边防军），作为段的基本军事力量，好让他完成武力统一的愿望。这是日本西原借款政治背景的第二个原因。

那时日本已参加协约国方面对德奥宣战，但中国尚未参战仍是中立的立场。日本深恐中国被德国所诱惑，如把中国丰富的资源及劳动力供助德国，这对于协约国方面显然将大为不利，因此不能不尽力拉中国加入协约国方面一同对德奥宣战。所以西原在奔走借款的同时，也努力促动中国参加欧战。这是日本西原借款政治背景的第三个原因。

日本对西原借款的经济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各国苦斗的结果，替日本工商业造成一个高利润大发财的机会。对外贸易大大出超，国内货币过剩，形成通货膨胀的局面。财政界的首脑人物为了制止财界混乱，调剂物价平衡，必须设法紧缩通货方可收功。因此，极力鼓励向国外投资，以减少国内筹款的充斥。那时期日本曾先后向英国承受国债日金二亿八千万元，向法国承受国债日金七千六百万元，向俄国（帝俄）承受国债日金二亿二千二百万元。对中国除了上述西原借款之外，尚有通过其他途径缔结的各种借款如次：

1. 善后借款第一次垫款日金一千万元；

2. 善后借款第二次垫款日金一千万元；

3. 善后借款第三次垫款日金一千万元；

4. 直隶水灾借款日金五百万元（这一笔借款是由中日实业公司总裁李士偉代表日本兴业銀行、中日实业公司等十一家財团組織的銀团与中国簽訂的，并没有經過西原之手，所以不能列入西原借款之內）；

5. 吉长鐵路垫款日金六百五十万元。

此外还有其他零星的地方性借款和专业性借款很多，并有与美国合放的中美运河借款美金六百万元，总数共达日金六千二百六十万元、英金五十三万六千鎊、美金三百万元。这是日本西原借款經濟背景的第一个原因。

日本一直垂涎着中国无穷尽的丰富資源，欲加染指进行侵略。經過二十一条交涉硬索手段遭到失敗之后，不得不改头換面从借款修好的手段来謀求經濟合作，再逐步实行掠夺中国的資源。这是日本西原借款經濟背景的第二个原因。

西原借款日本方面出面承借的銀行

日本是四国大借款銀团成员之一，受到銀团的拘束。当时日本在外交方面对英美两国显然都还存有顾忌。若单独对华大量借款，深恐引起国际上的詰責，故除了秘密办理之外，还必须避开国际銀团的关系，因此决不能由参加四国銀团的正金銀行来出面。經過研究之后，台湾銀行和朝鮮銀行都是特种銀行，朝鮮銀行在朝鮮和东北都享有金票发行权，两行在华北华南都有不少分支机构；日本兴业銀行也是特种銀行，专营长期投資业务，又有发行債券的特权；故决定由兴业、台湾、朝鮮三个特种銀行联合起来担任出面。同时

为了对中国进行經濟侵略做好基础，又向中国提議創立中日合办的銀行，得到中国方面同意，成立了中华汇業銀行。中华汇業銀行于1917年8月成立，1918年1月开业之后，对于有綫电报借款和金矿森林借款两笔并由三銀行委托中华汇業銀行出面簽訂，都是为了避免列强的注意。

西原 龟 三

寺內正毅曾任朝鮮总督多年，胜田主計帮他在朝鮮主持理財工作，西原龟三也是跟隨寺內在朝鮮工作和策划的人，因此他們三个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寺內、胜田对于西原全都十分信任，可算得是言听計从。寺內組閣之后，胜田出任大藏大臣，西原則并不担任任何名义，只是做一个幕后的秘书，代寺內、胜田两人筹划献計，无不采納接受。他在大藏省內可以随便命令指揮胜田的幕僚，也能随便指揮兴业等三銀行的人員听从他的命令办事，真是一个神秘的人物。寺內决定采用“中日亲善”政策之后，就派西原全权奔走联系，先后締結了一系列的各种借款条約，总数共达日金一亿四千五百万元，就是世所熟知的“西原借款”。

章宗祥写有《任闕齋回忆录》（是稿本，并没有刊印），曹汝霖写有《民初外交回忆录》（曾刊登香港的一个小报上），其中均有关于西原借款的叙录。两人都是西原借款的經手之人，其資料自具有参考的价值，茲分別摘录于下。

章宗祥在《任闕齋回忆录》中写道：

“我奉命使日启行前，由日本駐华武官阪西介紹西原来見。西原說寺內不久將組閣，主張一反从前政府的态度，彻底实行两国亲善。我与西原当时并未深談，以为亲善之談不过是門面話而已。及

到东京，寺内内閣成立后，西原又亲見，重申亲善之說。他說寺内渴望中国有一个坚强的人能够担负統一全国的责任，这个人就是段祺瑞。段現任总理，正在筹划統一南北。要做好这件事，第一要有相当武力和充分的財力，这两点段現在还很不够，日本如果从这点进行，于段必极为有利。軍备首先是要錢，所以应该从經濟上着手才是根本办法。在当时，中国各处都有大隈内閣所遣派的浪人在各地方兴风作浪尽情捣乱，尤其是山东胶济沿綫一带更鬧得凶，这个让主办交涉的人感到十分头痛。余曾托西原向寺内轉达中国方面对浪人加以取締召回之希望，結果立刻下令召回各地浪人，一律限期回国，始稍稍异之。过一天西原又来談，中国要整頓財政首先需要一笔款子，中国如要借款，日本可以想法。我答以中国向来借外債都有回扣，因此不愿与聞致蒙瓜李之嫌。他隔几日又來說，你的顾虑日本已研究出一好办法，就是借款十足交款不給佣金，如此經手的人显然就可以干净了。我因此为他介紹成就了第一次交通銀行借款日金五百万元。以后西原徑往北京接洽，陸續成立各种借款，就是内外宣傳的所謂‘西原借款’。又因借款汇兌必須經過銀行，陆宗輿就創辦了中日合办的中华汇業銀行經營借款的汇兌业务。

“西原借款最初主張由日方銀行借与华方銀行，显示不涉政治，但是后来范围扩大，不能坚守这个原則。交通銀行第二次借款，名义上为整理业务，已引起日本外交方面的异議，說有政治性质，要求由各国銀行团承攬。当經說明交行整理业务需款向三銀行借款純系同業通融性质，与政府絕對无关，遂由三銀行派員到北京調查交行营业状况，在北京簽訂合同。此后，电信、金矿森林借款虽由中华汇業出名承借，已純粹为政治性质，日方外交官遂有种种条件提出。西原初意主張所有借款由两方实业家先行協商妥定，再

交外交官承认，然事实上未能办到，鐵路借款等均由三銀行直接簽訂。最后参战借款由两方軍事人員参預，更是另一种性质，与当初經濟提携的用意，全属两事。”

曹汝霖在《民初外交回忆录》中写道：

“复辟之后，旬日救平。段合肥入京組閣，仍征余长交通。余以被交通銀行股东会举为总理，深恐不能兼顧，乃力辞不获。接任未久，有日本人名西原龟三者，以公府（当时称总统府为公府）顧問坂西利八郎之介紹来見。自称奉寺內总理之內命，来华謀改善国交力图友好，方言大隈內閣政策之錯誤；又云貴国目前最困难者莫如財政，因受四國銀行团之限制，不能单独任事，惟如有所需，敝国愿尽微力。此次以私人資格請見，不經日本公使介紹即是为此。坂西又盛称寺內任朝鮮总督时，西原幕后划策，深得信任云云。余以交通銀行挤兌以后，元气未复，姑以銀行名义商借日金五百万元，以观其信用。西原电东京后，由大藏大臣胜田主計回电允許，并未要求抵押，借款乃迅速成立，方信其言非夸。后以財政总长梁启超辞职代以王克敏，不久王又辞职，合肥坚邀余兼任財长，余辞以无此精力。合肥云，交通部有曹虎在，君請多問財政部事可也，坚辞不获，乃就任財政总长兼职。

“其时財政困难已达极点，各省应解之款都为地方扣留。发內債則旧公債尚未整理，續募为难。借外債則有四國銀行团之約束，緩不济急，且亦不易磋商。因西原有如有所需可以效力之言，乃与商向日本政府借日金二千万元以有綫电报作抵押品，得到成功。并称此款由日本兴业、朝鮮、台湾三銀行墊借，不向市上經募，故可省却手續費及借款折扣等等，故合同訂明实足交款不折不扣云云。余感其誠懇敏捷，并言此后中国建設需款，希望多助。彼答称若为

建設借款更愿效力，此款彼此心照，不限定用于电信方面。叶次长要求撥五百万給交通部为修理海底电綫，余亦照允，余則全挪为政費，以当时政府軍警、教育、出使等各項經費，每月約需二千萬元，而財政部所收关盐余、烟酒稅、印花稅等，合計不足一千二百萬元，悉恃借款为弥补。后以开支不繼，又陸續向日本商借，日本方面亦有难色，派員来商，实則調查情况。西原从中斡旋，又允續借吉黑两省金矿森林借款，此是西原授意，以銀行方面只知道要数量較大之抵押，若以森林为抵数量甚大，而采伐困难則銀行不知也。森林金矿均属于农商部管轄，商得田文烈总长同意，亦由日本專員米华簽訂。（按此款系由中华汇業銀行出名簽訂。）

“但政府出兵不利，局面又非，余甚灰心。合肥亦以政令不行，府院意見不合，亦有倦勤之意，拟商借二千万日金以为結束之計。西原在京深知我國內情，頗同情于合肥，自告奋勇，愿回国面陈，予合肥以最后之援助。其时日本寺內內閣亦有改組之說。正在磋商之际，合肥忽与河間宣告同时下野，借款問題因之擱淺。交通銀行方面极愿将此款移作交通銀行商業借款，余以有总理名义关系姑允試商。經日本調查之下，居然允将二千万日金移借交通銀行。（按交通銀行第二次借款締借于1917年9月，馮段同时宣布下野是1918年8月31日之事，曹氏此一段記憶可能有誤。）

“迨新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合肥退任参战督办，錢能訓組閣，仍强留余联长交通。余力辞，徐亲自极力挽留，余以东海知遇，感于私誼，遂允联任。东海就任后，主張和平統一，需款更巨，財部无法支应，乃与日本續借二千万日金。时日本外相为后藤新平，曾任南滿鐵路總裁，东海任东三省总督时与之頗有交誼。經后藤之斡旋，此項借款得以成立，惟要求以德國已失之高徐、順濟鐵路借款